

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效率和发展的一类等价命题

袁富华 张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以高速增长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工业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对知识生产配置作用的长期忽视。与工业化增长模式不同,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构成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的实质。消费结构升级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需要依赖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展,以此作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关键词] 发展;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8.06.002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8)06-0015-10

一、引言

作为理解发展的一个新的和综合的角度,本文尝试着对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发展内涵,给出一个逻辑上的分析,目标是建立经济效率与知识技术阶层扩张之间的等价性。不同于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工业化,在转型和城市化阶段,供给侧的效率改进是一个涉及投资再平衡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由消费结构高端化所引致的知识生产配置及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实质,这一实质进一步体现在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和稳步扩展上。

作为趋向发达城市化的必由路径,(与消费结构高端化对应的)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发展理念,不同于中产或中间阶层再生产的传统认识。一个重要区别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个体或群体,通常具有上升到中产甚至更高阶层的能力和稳定性,转型和发展社会的首要目标,就是注重培育附着于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新特性。现有中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当随意和宽泛的概念,但是,我们强调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和专业化特性,在此意义下,即使存在中产,那也必须是有知识技能支撑的中产。

从发展阶段变化和可持续性角度来说,经济效率的不断改进,需要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来支撑。此时,消费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目的,消费结构的升级——特别是与人力资本生产相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15ZDC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

[作者简介] 袁富华(1968—)男,山东成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增长。

的消费比重的增加,越来越具有阶层区分和差异化的特征。就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而言,高端的科教文卫消费具有跨期或代际投资性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技术职业的创造。就城市化的可持续性而言,职业发展或者就业质量的提高,比经济效率更具有优先性。

二、等价性

(一)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展转换为生产率

我们首先提取一个抽象的社会空间,据以观察经济效率产生的社会环境,以便从一个侧面重新给出发展的定义。这个社会空间的原型,由布尔迪厄(2017)^[1]关于社会阶层划分和定位的三个基本维度构成:即,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这两个属性的动态变化。特定阶层成员的资本占有,是经济资本和教育(及其他文化)资本的合成,社会阶层的资本及其变化,影响着消费模式和品味的变化,也因此决定了阶层区分。现实中,作为群体和个体差异的一类主要区分性因素,职业和职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职业的多样性和社会流动性,是促进社会经济变化的积极因素。这个出发点把我们带入发展——这个传统理论主题的重新认识之中,职业,就其社会的和经济的双重属性而言,它的结构和它的变化,本质上是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纽带。

与职业变动相关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和问题,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别是从工业化走向成熟到大众高消费阶段(及其后)——表现得最为突出。正如传统经济理论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如果把工业化过程看成为了解决物品稀缺而进行的偏向于产出增长的过程,那么,对于这种目标的追求,最终将会遇到非经济条件的制约。从动态和联系的角度看,经济过程自身无法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2],在一定阶段上,职业发展即相应社会阶层的变化,甚至可能比经济效率具有优先性要求,或者,经济效率依附于职业特征以及职业变化趋势。正如加尔布雷斯(2012)^[3]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以一种总体思路把握经济发展或经济变革,以免让对经济目标的强调以其他更有价值的利益为代价而垄断生活,当稀缺时代结束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商品的消费数量而是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提高与职业发展,与横向的岗位数量增加和多样化以及纵向的知识技能提高密切相关。从这个现实逻辑来看,消费不再是单纯为了满足或享乐的目的,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体现为区分和差异化^[4]。由此引申出了我们关于生产系统和社会系统等价性的第一个命题: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展转换为生产率。与简单追求物质满足的普通民众比较起来,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可以从知识技能累积和品味变化这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在 Rostow (1960)^[5]那里,技能提升和消费偏好多样化,被看作大众高消费时代赖以维持的主要因素,加尔布雷斯更是明确把技术专家和知识阶层的存在,看成发达和富裕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本质特征。

因此,从“社会→经济”这个逻辑方向来看,应理清两种带有模糊性甚至错误的认识:(1)利润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观念。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成本-供给最优化度量,如果不与社会发展中知识技术阶层扩展这个创新的动力源泉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诸多非经济约束条件的本质重要性,类似的经济分析也将失去本质意义——重复一下,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看,职业发展即相应社会阶层的变化,甚至可能比经济效率具有优先性要求。(2)人力资本的属性问

题,作为既具有生产要素特征又具有社会身份区分价值的一类指标,它充当了联系品味变化和(由产出多样化和质量提升体现的)效率的中介。在典型的发展意义上,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充当了人力资本和创新的支撑。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既可以通过上层阶级—典型如拉美;也可以通过平民阶层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是知识技术层的扩展主要路径,也只有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总体的发展和进步。

(二)生产率转换为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知识生产配置与知识技术阶层扩展的经济环境。布尔迪厄运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配置以及两者的变化,对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强调经济资本向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转换,是社会职业变化和新阶层产生的促进因素;或者,按照加尔布雷斯更加明晰的表述,就是包括技术专家和科教文卫工作者在内的白领阶层的扩展,以及白领阶层对蓝领阶层的替代。根据发展阶段理论,这种趋势对应了城市化阶段的大众高消费阶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以知识技能为特征的中产阶层的崛起引人注目。对此,有几个问题需要给出一些更加细致的分析:

1.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概念。鉴于这个流行的概念的模糊性,我们用知识技术阶层这个更加狭义的概念替代,用意是明显的,即我们倾向于使用吉登斯(1998)^[6]的“现代性”概念理解中产阶层的发展,在他那里,高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专业技术知识的积累和广泛运用,这同时构成了现代化过程和增长可持续的本质特征^[7]。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与效率持续增进和社会流动性紧密联系的概念,但是误解也容易在这里发生。

首先是统计学上的简单分类带来的混乱。为了显示发展绩效,人们习惯于使用收入或财富指标把中产阶层分离出来^①,而忽视同样重要的其他指标——尤其是反应该阶层变动趋势的知识属性指标,而知识技能恰恰是现代化意义的中产阶层的本质特征。比如,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和拉美国家的中产阶层的区别,不仅仅在财富占有上,而且突出表现在专业技能和知识拥有及其积累上。其次,经济资本转换为教育资本的能力,以及这种跨期转换的持续性(对子女的投资意愿和能力),这是知识技术层扩展和再生产的动力,在发展问题研究中容易受到忽视。从“经济→社会”这个逻辑方向来看,再生产循环提供物质资本和服务的同时,也再生产出来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和投资方式,对于发展的阶段变化这种动态情景来说,经济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教育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提高,反映了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与简单拥有财富的中产阶层不同,知识技术阶层的成长是再生产的根本性动力。由此引申出了我们关于生产系统和社会系统等价性的第二个命题:生产率转换为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大再生产。

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生产层面,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大,意味着生产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连同高质量投入要素数量的扩大),个体或群体经济资本向教育的转换增加了专业技能等相关人力资本,改变了劳动力要素的性质。第二,附着于个体或群体之上的其他属性如

^①即布尔迪厄的经济资本概念。

品味等,也将因为经济资本向教育投资的转换而提高,并推动消费者的身份发生变化,进而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

2.中产阶层稳定性问题。我们强调发展过程中知识技术阶层的成长和培育,还有一个理由和担心,即中产阶层的不稳定问题,这个问题在布尔迪厄(2017)^[1]、鲍德里亚(2015)^[8]那里受到关注。如,鲍德里亚认为工业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具有一种临界的和不确定的地位,属于正在整合的阶层,处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关节点上。问题根源在于这个阶层平均说来比较尴尬的经济条件:这个阶层必须通过教育投资发现上升机会,否则将不得不面对下降的困境,因此(代际)教育投资的资金约束是一个关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一些经验支持:

停滞的中产阶层与停滞的经济。对于教育投资和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长期忽视,是拉美国家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前期研究显示,在三类人力资本模式中,拉美模式是最不利于知识技术阶层成长的^[9]。具体地:日本和韩国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均发生了高等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和高等教育在劳动力中的普及,而且,日本在大规模工业化初期,就明确认识到知识技术阶层扩展的重要性,把工业化建立在内生的知识创造和创新基础上,这是可以借鉴的成功追赶模式。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采用的是加工制造业和出口拉动,这种增长路径反映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就是积累了占比很大的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目前正面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但是鉴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刚性约束,只能走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路子。与这两种模式相比较,拉美国家普遍呈现出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局面,而且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比重相对较低且教育质量较差^[10],这种问题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的缺乏,导致了拉美城市化时期的震荡和不稳定。

棘轮效应。我们对于知识技术阶层的强调,旨在突出发展过程中阻止经济向下震荡的一种“棘轮效应”。更加明确地说,教育投资有利于上升阶层的成长——在发展状态下主要是较下层的民众阶层向中间位置的上升,当然,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也会阻止现有中产阶层的下降。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假设是,只要上升的势头保持着稳定,便有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张和经济活力的发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潜在的社会结构的僵化被打破,知识技术阶层本身具有的活力,实际上赋予了经济发展面对各种风险和冲击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震荡不会对长期发展造成伤害,因为有着知识技术阶层的适应能力。

3.品味的生产与变动。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及相应经济资本向教育投资的转化,蕴含了品味的再生产和偏好变化。人力资本就其品味属性来说,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传统和现代赖以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正是在这种再生产意义上,消费效用已经不仅仅是甚至不是一个最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分和差异问题——这种认识在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加尔布雷斯、罗斯托那里以不同的表述存在。重申一下,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践和历史中,品味再生产和显示为动态变化的经济条件有两个:一是通过教育的投资特别是代际的跨期投资,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化,以此推动知识技术阶层的成长和品味变化,知识积累和知识生产配置方式的变化,是促进品味变化的力量。二是,伴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知识积累和存量调整,新的品味不断引入、传统偏好不断更新,并且日益与新产品、新服务相联系,品味再生产也因此越来越具有与传统不同的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联系经济和社会

两大系统的联系进一步分析。

(三)协同

基于上述两个等价原则,本部分对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一些主要的关联机制给出分析,针对的是人力资本作为再生产要素和品味这两个层面,由此获得关于发展的一个新的综合认识。这种认识立足于知识技术层的再生产,并将其作为发展可持续的关键环节看待。

1.需求、生产与协同机制。推动消费变化的是优势需求^[11],这种在特定阶段占支配地位、必须首先保证满足的需求,包含总量和结构的意义,优势需求的更替沿着产品或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进行。消费和生产协同运作的雁阵更替模式,隐含了布尔迪厄所谓普遍化的恩格尔定律,也就是更加新奇的、特别的新消费品的出现,更新了消费者品味,新一轮的优势需求出现,这也是现代过程中企业生产创新的一种普遍取向^[12]。

2.报酬递增、知识技术层成长与发展。根据S型曲线的更替规律,每一轮优势需求的产生和产出扩张,总有报酬递增机会的发现,这种变化通常与消费者偏好的再生产及其不断变化有关,品味的这种上升倾向与拥有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消费能力有关,它是发展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优势需求的更替在两个维度上与专业技术技术的扩展相关:横向的规模扩张,也就是产出和消费的上升直至饱和的阶段,这个阶段对应了知识技术阶层消费水平的持续扩大。纵向的质量提升,一般代表了消费品味的较大变化,或消费品知识技术含量的增加,是一种知识技术阶层扩展的棘轮效应。

由此,我们得出本文关于发展的一个主要观点:从发展阶段变化和可持续性角度来说,经济效率的不断改进需要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来支撑。此时,消费不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与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越来越具有阶层区分和差异化的特征。特别地,就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而言,高端的科教文卫消费具有跨期或代际投资性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的关键在于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创造,职业发展就其现代性而言,比经济效率更具有优先性。

三、阶段性和转换

以上文理论框架为基础,我们拟对一个理想的发展过程给出分析,这个由工业化阶段、

转型阶段和现代城市化阶段构造的长期发展路径,近似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短期内实现赶超的阶段演进情景。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着物质资本时代、资产时代和知识时代^①。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与消费偏好和社会阶层的特征存在着一致性。

(一)工业化、资本积累与消费

罗斯托(1997)对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得益于不断增长的物质资本,工业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终结普遍的稀缺和达成普遍的物质消费满足。根据前面的文献征引及发展思想,发达国家以及像日本那样追赶成功国家,在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也注重越来越具有现代知识技术能力的劳动力的培育。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业化追赶国家而言,受到再平衡能力的制约,阻碍发展可持续的结构

^①加尔布雷斯(2012)的发展阶段是土地控制、资本控制、技术专家控制。

问题得不到及时矫正,甚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投资与消费理论观念的补充解释。无论是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还是仍然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经验就是国家干预——典型如通过价格扭曲实现国家对私人储蓄的替代,以此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这种做法大都源于追赶国家工业化初始条件的特殊性:劳动力过剩和非现代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称为追赶,主要是因为工业化以物质生产增长为中心,以消除普遍的稀缺为首要目标。追赶的一类路径是,规模和效率建立在储蓄向投资的持续转换之中,并从根本上形成对消费的压抑。另一类是 Nurkse(1958)^[13]国际示范效应下的消费早熟,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实际上,这两类发展路径所遵循的理论,通常都是消费作为投资抵消项这个传统观念,虑及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性,这个基本观念需要修正。在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这种修正体现为对消费结构升级及其蕴含的效率补偿效应的认识^[14],在工业化步入成熟直至迈向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阶段,效率补偿作用始终是理解发展的一个枢纽。

职业和阶层变动的原因与转换。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资本快速积累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按照罗斯托的增长阶段思想,从起飞到成熟的工业化过程,推动了与经济相关的社会阶层上升和职业现代化:在二元性缩小的同时,现代部门的内部分工发生积极变化——体现为横向的行业和部门多样化,以及纵向上产品质量提高和新行业对老行业的替代,就业质量和数量不断扩张。这个变化对劳动力的知识技术能力的增加提出了要求,并导致具有知识技能属性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新阶层的产生。即使如此,就消极方面而言,与其后更高级的理想城市化比较起来,工业化过程中的消费结构仍然以物质品主导,(相对于知识消费而言)相对低廉的物质品消费成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以压低消费以取得快速增长和追赶的现象,在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普遍。

消费的局限。这个阶段的所谓中产阶层,更多是从收入和财富占有上定义的。换句话说,品味更多表现在技术劳动力的消费偏好之中,消费结构处于恩格尔定律的较低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很显然的,只是在二战后,教育发展和知识累积在发达国家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消费者品味的再生产与工业化这个阶段的规模化、技术标准化是一致的。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那些旨在快速追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积累过程对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的抑制更加严重,这种问题要么表现为短期内消费的收入弹性偏低,要么表现为对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忽视。

(二)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与路径分化

从工业化成熟到大众高消费时代的这个转型时期,或者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的时期,由于稀缺性得到缓解甚至消除,发展开始出现向富裕社会演进的特征。二战后国际发展经验的对比表明,这个时期大致与中等收入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提升的过渡时期重叠,其典型特征是,发展进入了一个资产时代,财富、风险和不稳定主导了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本质上不同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情景。转型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有两类,一是比例较小且上升能力较弱的贫困问题,二是知识技术层的扩展和提升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有关,中产阶层的状况直接反映了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

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诱致的减速及其冲击。转型过程中,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对制造业的替代,原有依赖工业体系的规模化动力机制受到削弱并导致增长减速,直接后果就是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这种趋势与城市化阶段的高成本相互作用,成为抑制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障碍,导致持续效率改进阻断。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型时期的常见问题。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表明,后发国家转型时期的经济调整,重点在于效率改进的可持续性,但是恰恰因为消费结构高端化、服务业现代化和制造业深加工度化这个良性发展环节的缺失,导致了收入增长不稳定及其一系列后果。

职业分化。当然,上述良性循环的缺失或者延迟,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僵化的刚性约束有着很大关系,尤其是以追赶为目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路径依赖和调整滞后更加明显。正如我们前期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如果说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有可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和内生机制无法建立——这种发展阶段非连续问题的话^[15],那么这种问题的起因也只能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失调中寻找。主要的约束仍在于社会阶层和相应的职业发展瓶颈。转型时期的职业结构与经济部门和行业的结构一致,这些行业由工业化规模扩张产生,劳动力收入和知识技能水平也是由相应的工业生产技术决定。按照产业雁阵理论,在制造业进入知识技能密集的深加工度化之前,经济主要充斥了中低层次的劳动力,此时职业发展沿着工业化规模扩张的路径以横向扩展为主,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甚至出现非正规就业部门的不断扩张。此时的职业发展是适应于规模经济的标准化、物质供给而发生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过度竞争压低工资,在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

公共政策。转型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开始增加,但是受到工业化自身路径依赖的影响,这些政策很多时候并不能惠及大众,特别是针对有利于知识技术阶层所给予的教育投资相对较少。由于投资需求主要围绕工业化和产出增长建立,这就造成了如下后果:在以国外先进技术替代国内技术基础的情况下,纯粹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以至于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仍然是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发展。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结构扭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选择上,长期忽视了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换这个环节。

转型时期既是中产阶层的扩展时期,也是中产阶级由于经济不稳定和公共政策忽视而下降的时期。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换的缺失,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迟缓或高层次消费结构无法达成,将最终导致效率和社会发展良性循环基础的缺失。就转型时期的普遍情景而言,这时候稀缺问题得到缓解,工业化的生产力使得财富得以累积,资产时代主导的格局也基本形成。但是,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受到原有路径依赖的影响,消费者个体和经济部门的需求通常局限于一般的生产技能,消费结构升级受到抑制,从而在根本上阻断了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知识技术阶层的成长。最终结果往往是:第一,短期内,以抑制消费为代价的持续的高投资,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和投资结构扭曲,产生无效率的生产再循环;第二,长期中,知识技术再生产的培育缺乏一个稳固的社会阶层支撑,进一步放大无效率的再生产循环,最终造成城市化发展的不稳定。

(三)城市化和知识技术阶层

对于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问题,这里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它为现代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须。为此,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们前期研究的一个观点:不同于工业化阶段以物质品需求为中心的消费模式,城市化阶段的消费倾向于科教文卫等项目,消费越来越具有跨期或跨代投资的性质,这种特征与服务业要素化或知识技能自身再生产的趋势相关,同时,这也是知识技术阶层成长的经济社会背景(袁富华、张平,2018^[14])。城市化进程中消费倾向和品味的上述变化,不仅意味着消费作为投资抵消项的认识需要扭转,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消费的跨期影响,工业化下利润最大化的传统假设也受到削弱^①。知识技术层再生产和知识要素累积,更加强调上文所述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协同和内生机制的培育,这是不同于最大化计算的另一种模式。

转换与城市化发展的侧重。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转换,是城市化阶段投资再平衡的重心。

只要论及发达城市化的达成及其可持续,知识技术阶层的稳定和扩展问题总是无法回避。深入到结构的深层观察不难发现,作为工业化进步的产物,现代城市化总是体现为品味和技术的提升,职业现代性越来越成为经济效率持续改进的条件和保障,从而与作为工业化结果的职业的发展路径显著不同。也正是由于知识技术阶层所具有的阻止阶层下降的棘轮效应,发达国家城市化才能出现效率改进和人的发展的良性循环。

发展连续性的机制。这个良性循环在现实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一是为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城市化提供效率补偿,从而维持“消费结构升级-资本深化-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系统;二是避免拉美国家那样的效率改进和知识技术阶层扩展路径的中断,这是我们对于城市化特殊性的一个基本认识^[16]。其中,就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协同性而言,与科教文卫相关的那部分高层次消费比重的提高,直接与服务业结构现代化和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相联系,并将最终引致就业质量的提高,知识技术阶层和经济因此也将获得稳定发展。

生产消费一体化。无论是工业化阶段的投资偏向还是城市化阶段的成本病,都是对生产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破坏。城市化的知识过程,与工业化围绕物质品提供的生产函数不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消费者品味多样性和差异化之上,也即服务业和消费的非标准化和个性化追求。这不仅表现为现代服务所包含的知识密集度的提高,而且体现在制造品的技术知识含量提高,也正是因为如此,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协调又成为关键。于是,我们回到了本文第二部分的观点——知识技术层具有生产要素和消费多样性的双重特性,它的扩展和稳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协同运作的基础。由此引申出第三个命题: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促进城市化。

四、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参照上述逻辑分析,这里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城市化的主要现实问题,给出几点说明:

1. 利润最大化追求及其扭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深加工度化和知识信息密集阶段的转

^①加尔布雷斯(2010,2012)基于专家组合的特征论述发展过程中利润最大化的不适用性,本文把这个观点纳入到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之下。

型时期,并与两种其他两种转型叠加:一是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提升;二是工业化生产供给主导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现阶段广受关注的投资消费失衡、城乡发展失衡、生态环境失衡等等问题,都与以往增长产出最大化的发展理念及其扭曲效应有关。这种注重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理念,是建立在压低劳动力价格、抑制消费、忽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基础上的,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调整和演进,也是以最大化利润和产出为前提,而不是注重长期的内生动力和结构变化适应性的培育,这一点与追赶成功的日本的工业化路径有着本质不同。

2.转型时期的扭曲。中国经济的最脆弱之处,在于忽视了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过程的建立。这个过程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和互联网的建设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消费便利,这毕竟是表面的经济现象。关键之处应是让未来的城市化具有现代性内核——即消费结构升级和知识过程的建设,换句话说,就是知识生产配置能力和内生增长机制的建立。我们之所强调这一点,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工业化长期坚持的技术外部依赖和加工贸易路线,导致现阶段人力资本低度化问题突出,鉴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未来二三十年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与日本、韩国差距仍将有较大差距。第二,服务业不是一个规模问题。城市化和由此导致的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应视为更高效率的行业替代低效率行业,而不是简单的比重增减替换。为此,应该抛弃服务业的规模发展理念,培育服务业发展的效率补偿能力。第三,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特别是所谓的非实体经济挤压实体经济问题。

3.被忽视的阶层提升问题。就像发展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中国快速工业化解决了稀缺问题,转型和城市化过程的新任务是实现富裕。问题在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理念,对于知识技术层成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典型如,文献和社会舆论的争论焦点,很多仍然立足于经济资本范畴的中产阶级定义,这实在是一种混淆甚至误导。我们认为,强调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展,就很容易理解现实里中产阶级不稳定的一些原因,特别是城市化的知识生产配置的重要性这个本质。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工业化的确造就了不少中产阶级。但是,如果考虑到中产阶级再生产所需要的收入持续增长和宏观稳定这些因素,知识技能越来越成为关键。

4.服务业与消费观念的再探讨。鉴于中国人口规模的庞大,人力资本再生产和劳动力要素更新必然迟缓,平均数意义上的高层次人力资本比重意义不大。这就为城市化发展提出了知识集聚的要求,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现代化为龙头,实现产业发展协同、城乡发展协同。这就再次回到了我们一再强调的服务业和消费的补偿效应上——即通过知识-人力资本循环的嵌入,达成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知识技术层主导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要为中国城市化成功与否树立评价标准的话,那么可以将知识技术阶层是否保持了健康的发展,作为唯一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袁富华,张平,李兆辰.增长非连续的原因与创新路径的转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01):112

- [3][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M].嵇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4][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5]Re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北京:三联书店,1998.
- [7][美]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董其祥,纪坚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9]袁富华,张平,陆明涛.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J].经济学动态,2015,(05):11-21.
- [10]Hofman, 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0.
- [11][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生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2][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M].于海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 [13]R. Nurkse.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 [14]袁富华,张平.稳中求进:风险防范与效率增进——兼论储蓄、投资、消费的再平衡[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2):39-45.
- [15]袁富华,张平.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停滞与增长跨越——兼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05):82-91.
- [1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11):4-19.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tratum: A Kind of Equivalent Propositions of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YUAN Fuhua, ZHANG P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main problem brought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goal of high-speed growth and profit maximization is the long-term neglect of the rol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growth mode,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tratum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the urbanization led by consump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associated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human capital need to rely on the expans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tratum, which conducts the ba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tratum; Reproduction